

## 抗战时期清华人教育兴国的实践

○李靖森

### 从两张老照片说起

这两张老照片快有70年了，是抗战时期开办在云南省昆明市与呈贡县间、跑马山脚下“桃源新村”的建国中学集体照。第一张是1942年建校一周年，部分师生在校舍前留影，上有名誉校长胡淑贞女士（二排右7，1939外文，现97岁侨居美国）题字；二排右8是学校创办人之一、校董李吟秋教授（1922）；二排右9是对建村、建校给以大力支持的李沛阶先生（桃源新村地主）；二排右10是建国中学校长王家璋（1939教育）；二排右起第一位是历史老师，第二位是语文蔡老师，第三位是英语崔老师……



第二张照片，拍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该校初中结业典礼后部分师生和来宾的合影。照片前排坐者中，左起第6人、第5人，是闻一多先生与吴晗先生；左起第7人是盟军在美国的驻军最高指挥官，第8人即李吟秋；右1即名誉校长胡淑贞，左4即校长王家璋。后两排站立的，是即将踏上人生新台阶、被老师们寄予厚望的毕业生们。

第二张照片背景中，右侧突显出的建筑——简陋的茅舍，是与建国中学近邻的“恩光小学”的校舍；在照片左上方有些不甚清晰的帐篷，那正是盟军通讯营的营房，他们以此为基地，曾开赴滇西、缅甸八莫等地执行军务，为将日寇逐出云南、解放缅甸做出了牺牲。透风的军营帐篷与简陋的校舍，正是那个岁月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统一的写照。

两张内涵丰富的照片，更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它记载着在抗战的

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

艰苦岁月“清华人”教育兴国的追求与实践，留下了与中国命运相关的两位知名人士社会活动的身影；更有默默无闻为教育奉献的清贫教师们，也记载了盟军助学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情谊。

### “桃源新村”的兴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内地的企业、机关、学校……大批疏散至西南地区 and 云南昆明。昆明的城市人口剧增，一些企事业单位职工家属纷纷疏散到昆明郊县。有的零散租住农村民房，而较为先进、完善的疏散模式，就是择地建立新兴的村落。“桃源新村”就是这样的一座新兴文化村落。

“桃源新村”地处昆明市与呈贡县城之间的跑马山下，距昆明约15公里、距呈贡约10公里。这块理想的地段，深得筹建者的青睐。当时由原北洋大学教授、铁路工程师李吟秋邀集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等清华老同学酝酿建新村之事，他们得到了地主李沛阶先生的热心支持，慷慨拨

出几百亩土地供新村使用，至于土地之补偿，他表示：“好说，好说，当此国难之际，本应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么！”

新村由李吟秋作了规划设计。自1939年始，一座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新村，在跑马山下随着战局的扩大一天天发展起来。筑有道路、火车站、居民区、水井、菜场、公厕、学校、绿化带、发展区等，错落有序。为图个吉利，取名“桃源新村”。房屋都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茅草屋顶、土坯墙或干打垒墙的简易房，由自北方迁来的营造公司“大兴公司”等承建。

新村以“合作社”的形式，建房资金由各家或各单位自筹，交少量地租，若迁走，则房屋归地主所有。在那个年代，因物价飞涨，而地租直到抗战胜利也没调整过，实为象征性的。

到1940年底新村已初具规模，邮政总局、农民银行、石佛铁路办事处、西南联大部分职工、大兴公司、酒厂等都聚居于此。居民以文化界人士为主，如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许祯阳等，北洋大学李吟秋教授、云南大学马耀先教授，名医赵明德、薛子谦，著名教育家吴允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石佛铁路的著名工程师吴

融清、贾荣轩，房建工程师吴芝普等。

新村逐渐成为文化界活动的平台，西南联大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以及在呈贡县古城乡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吴文藻、费孝通亦常来探亲访友、切磋学问或评论时局。

### “清华人”办学

老一代“清华人”不仅国学功底深厚，大都受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熏陶，那种科教兴国的紧迫感，较之一般人更为强烈。抗敌名将孙立人将军，四处征战，走到哪就办学校到哪儿，创办过贵阳的“清华中学”，在缅甸，为华侨创办过多所“华夏学校”；在战后内战兴起局势尚且不稳时，他委托西南联大毕业生王伯惠（1944土木）在鞍山创办了“清华中学”。

桃源新村的清华人，同样抗战不忘教育。早期，请了位女教师，在一个空院子暂时办起临时教学班，由她一人担任高、中、低年级课程；接着与地主李沛阶商议，请西南联大教授许祯阳的夫人吴允文女士前来，拨地皮建起了校舍、礼堂兼教堂等设施，将其创办的名声颇佳的教会学校“恩光小学”于1941年上半年由昆明市内迁来，从此有了正规、完善且师资雄厚的小学。除了本村居民子女，新村附近西南联大子弟也前来就读，潘光旦教授的两个女儿都在此读书。从此“金马碧鸡，一东一西，山色翠微，湖水涟漪……我们明日是栋梁！”催人奋进向上的恩光小学校歌在桃源新村飘荡开来。

接着，他们又筹建起了中学。先是借用在“小塔密珠”的“护国中学”分校之

名开办，后因原“护国中学”在“小塔密珠”经营不善等原因，师生流离失所而解散，随后李吟秋与李沛阶、滇军名将甘芳（字济苍）等筹建起正规的“建国中学”，聘请王家璋任校长，省主席龙云的儿媳胡淑贞女士任名誉校长兼董事，吴融清工程师、李吟秋教授等均为校董事，甘芳任董事长。为支持该校建立，沈从文夫妇一家从呈贡县迁来，沈夫人张兆和教英语，沈从文则义务教授高中作文课，联大文学院萧涤非教授亦来任教。其他教师也多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师和学子。为弥补教学设备的欠缺，也常请西南联大的教师携带仪器设备来做试验演示。

昆明市教育局为防日机空袭，曾将一批图书存放该校供应用，真是雪中送炭。虽然环境艰苦、校舍简陋，但从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来说，在当时的昆明应列入一流。外县慕名而来的学生就不少。照片中的初中毕业生李清炎、胡鼎昌、杨焕文两年后都是由高中二年级跳级考取大学的，李清炎还同时考取南开和云南大学两所学校。

建国中学的经费，除了收取少量学费外，校董事甘芳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李吟秋教授为学校的筹建付出了心血。他吁请各方有识之士赞助办学，以减轻师生经济负担；为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教学多样化，除了利用西南联大的师资和设备外，还利用机会请社会名流作报告，向学子传播思想、文化，开阔眼界。

李吟秋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紧迫的使命感，他常说，这些年轻人，十年、二十年后就是国家的栋梁；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当今

## □ 联大春秋

教育问题——如何解决青年思想之徘徊与学术之空疏》一文中，明确提出办学的主导思想：“一、以孔孟之民本主义作现代政治经济思想之准绳；二、以颜李之实践主义，作现代学术与道德之圭臬。”且不论其阐述是否正确，但体现了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和良知。为了民族全面的振兴，他有自己的原则和抱负。他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以及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都概括、精练地表达在他所作的建国中学校歌歌词中：

西山苍苍，昆海茫茫，吾校建国，蔚起南疆，莘莘学子来四方，发奋为雄图自强；孔孟是吾师，禹墨事迹扬，颜李实践，后学津梁，莘路蓝缕为国光。

钟鼓堂堂，国旗飘扬，尊师重道，学术发皇，春风化雨乐未央，正德厚生教自强；三育智仁勇，服务社会良，农工为本，科学是昌，取精用宏为国光。

彩云飞扬，海水汪洋，师生荟萃，桃李成行，生存演进义方长，致知力行法自

强；古训修齐治，六艺作典常，勿忘勿助，无怠无荒。希贤希圣为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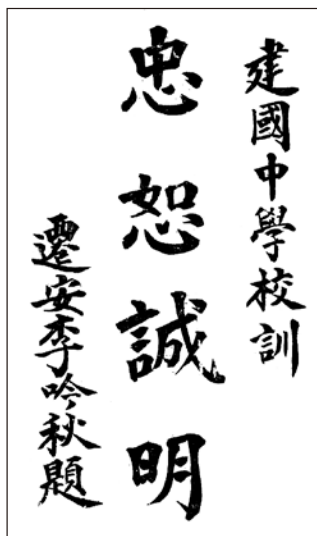
第二张照片记录的是李吟秋邀请闻一多、吴晗教授出席1945年7月建国中学初三班的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据当时的班长胡兴芬回忆：

典礼在高一班教室举行。把课桌在黑板前拉成一排作为讲台；下面前排坐的是来宾，后面坐的是我们初三班的毕业生和一些没有离校的其他班同学。

大会首先是王家璋校长讲话、李吟秋董事讲话。接着请闻一多先生讲话，他讲的大意是：桃源新村是一个美丽的新农村，住着铁路工人和职工家属，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教师 and 家属……在这所中学培养了一批批好学生、好青年，他们将来都是建设中国的栋梁！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什么是民主？就是人民有发言权、选举权，人民做主，是大家有说话的自由，不是一人说了算，不是独裁……他还谈到中国落后的农村问题。吴晗先生也讲了话。他说：“中国就需要一批学习好、能吃苦耐劳的好青年来建设……你们要努力学习，为建设中国做贡献……”

会上，我代表毕业的同学讲话，感谢学校师长的栽培，感谢闻一多先生和吴晗先生的指教。最后，王校长宣布毕业考试成绩，由胡淑贞名誉校长为毕业考的前三名胡兴芬、杨焕文、胡茗昌发奖。典礼在大家掌声中结束，校长请来宾和毕业同学到后面操场上拍了毕业照以示留念。

据现已97岁高龄的胡淑贞女士回忆：“记得那次陪母亲（张静娴，前排右3）和二姨（胡允文，右2）去，见到了闻一



多和吴晗等人，还同他们共进晚餐。”

这些看似普通且平凡的回忆，却见证了抗战时期清华人忧国忧民，为民族的未来悉心办教育的情景。

在办学过程中，盟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年代，一座边远的村庄，信息和文化生活是匮乏的，但美军军营的报刊、杂志、画报等，都敞开向学校提供；特别是军营播放电影，都允许师生前往观看，有时还到村民家中领小孩子们去看，黑夜中又打着手电送回家。那时世界各地

的反法西斯战况，我们都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在美军回国前，他们还为“建国中学”、“恩光小学”提供了大量运动器材和物资。缅甸战况吃紧时，大批华侨子女，其中有许多是孤儿，来到新村，被安置在恩光小学学习、生活。美军提供了部分生活用品，特别醒目的是，不分大小，发给他们每人一件羊皮的带白绒毛的飞行员夹克。

作者李靖森为清华1922级老学长李吟秋先生五子，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已退休

## 童年记忆中的叙永之行

○袁 刚

在联大九年的历史中，叙永分校存在时间不到一年，教职员为数不多，学生也仅是大学一年级的600多人。叙永的办学条件比昆明更差，生活条件比昆明更艰苦。但全体师生依旧满怀报国热情，教师坚持传道授业，学生勤奋学习发扬着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1940年父亲袁复礼受命至四川叙永分校任教，全家随行。叙永之行是我家抗战时期生活最艰苦，最动荡的时期，也是得到亲友、同事和学生帮助照顾最多的时

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同赴国难共度时艰的不屈精神。当年我虽只有7岁，但至今对这些颠沛流离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去四川以前我家住昆明灯华街25号，这里接近五华山云南省政府驻地，是日本



1939年袁复礼先生与子女摄于昆明大观楼